

采桑子书系

轻舟短棹西湖好，

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

隐隐笙歌处处随。

大众的 梦

高小康



无风水面琉璃滑，

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

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阳修





大众的 梦

小康

東方出版社

书 名 大 众 的 梦

DA ZHONG DE MENG

——当代趣味与流行文化

著 者 高小康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092毫米 1/32 6.375印张 145,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书 号 ISBN 7-5060-0302-3/B·43 定 价 5.95元

序

潘知常

仿佛是一夜之间，我们这个刚刚涉足工业文明的古老国度，一旦从睡梦中醒来，竟突然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已面临着以都市流行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地毯式轰炸。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神秘的入侵者，这种“大众文化”所掀起的那种轩然大波，那种世纪风云，刹那间便迫使中国社会这一巨大时空实体失去了往日的平衡。

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相、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于是，一个在西方世界早已唇枪舌剑多年而在我国却头一次碰到的大困惑，令人痛楚地摆在面前：应该怎样看待大众文化？人们焦灼着、探索着、争辩着、寻觅着。推崇者与诅咒者不屑于共事，钟情者与憎恶者挥拳相向，津津乐道的与充耳不闻的、跃跃欲试的与半推半就的、从中渔利的与逃之夭夭的

……这一切，使刚刚诞生的大众文化领域成为躁动不安、旋转多变的万花筒般的世界和无序状态，神秘莫测的迷乱星空。

就我而言，对于大众文化，倒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一笔抹杀。作为商品社会的主要消费形式，大众文化是完全应该被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推广和保护。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天职的国家，更应该这样去做。而且，大众文化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固然应该提倡，推广和保护；即便没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只要它是为大众所欢迎而且是无害的，就应该提倡，推广和保护。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何其令人信服：“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神圣家族》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或许我们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国家需要很“大的聪明”才能够承认“享乐的合理性”？但毕竟应该予以承认。道理很简单，大众正是通过这些东西实现了一种心灵的无言而诡秘的默契：灵魂的焦灼和骚乱被温柔地抚慰，埋藏心中的早已黯然萎缩了的梦又一次不同寻常地上演，蒙尘多年、暗哑无声的生命琴弦突然间被一只冥冥之手拨响，内心世界中无数琐细、纤弱、难以启齿的东西，瞬间汇成愉悦的生命漩涡……苍白的生命因此充溢了绿色的希望，试问，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不过，我也并不赞成对大众文化全盘肯定，一味叫好。在我看来，大众文化又毕竟只是人类文化中较为通俗，较为低级的一种，只是“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人们所亟待满足的绝不仅仅是“享乐的合理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和更高的方面。何况，在满足“享乐的合理性”的过程中，大众文化还掺杂了大量虚假的成份。在大众文化身上，仍然残留着原始文化的丑陋的胎记。它所修葺的是图腾寺庙，它所编选的也只是世俗神话。它用

流光四溢的媚眼，机智地引诱着大众文雅的堕落，并且通过白日梦的方式，有步骤地造就着大众欣赏能力的退化。而大众对它的接受则充溢着胁迫性、被动性、屈辱性，一味沉浸其中，则难免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吸毒者。这吸毒者只有倚仗大众文化所编造的梦幻世界才能聊以度日，宁可承担一无所有的灵魂空虚，也不愿涉足真实生活的生命悲怆。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尽管为“享乐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快乐，一种幸福，一种真实，一种审美，但假如不对之加以引导、提高，相反却放任自流，甚至听任它肆意越过边界侵吞“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枯鱼之肆，却又难免不会成为一种伪快乐、伪幸福、伪真实、伪审美。要知道，大众文化所加于人类的，毕竟只是一种浅薄的世俗、传统的观念，毕竟只是一种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遗憾的是，大众文化与大众之间，起码从表面上看来是那样鱼水难分，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彼此互补，这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地对之加以考察，以至于有人不无调侃地宣称：对之拥有观察视角的似乎只有知识者，一方面，作为大众的一部分，知识者同样与大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又有义务对大众文化保持着清醒的洞察。这使我联想到：大众文化的崛起，应该引起那些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良心而又禀赋着一定知识准备的知识者的关注，将之摄入自己的研究视界。也正是因此，当我看到小康兄的新著《大众的梦》时，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他受业于名师、有旷世高致，在器繁冗琐中能极逍遥之趣，在美学和中国美学领域，与我有共同的爱好。现在，凭藉自己广博的学识，他进而涉足大众文化的领域，通过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符号特征的精辟分析，去揭示其中蕴含着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明窗净几；一盏香茗，尽日快读，获益匪浅。顿觉红尘十丈之外，生出一片清凉世界。

在本书中，作者勾勒出当代文明中理性精神与原始的心理需要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消费性与符号性特征背后的非理性社会心理——对孤独与厌烦的逃避。在作者看来，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当代文明社会中的图腾崇拜。

作者在书中进一步对各种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明星崇拜、广告、畅销书等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并从感知觉特征的角度描述了当代大众文化的泛视觉化倾向，这些研究具体而微地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了透视和剖析，使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显示出深蕴其中的社会心理内涵，从而促使人们产生一种文化反省的自觉。

作者对大众文化符号的分析是实证的、生动的描述性分析，又是深入灵魂的心理分析，同时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分析。在作者笔下，大众的趣味时尚与种种深藏的心态被剥笋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揭示出来，给人以启迪。

通观全书，不难觉察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与隐忧。在他看来，当代大众文化的深层蕴涵着一种反古典理性精神的非人本倾向。这倾向在满足人们的无意识需要的同时使文明的发展产生着令人不安的蜕变。更不难觉察到作者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开拓，这是一种智力和勇气的双重开拓。在这当中，有非常的眼光，丰富的材料，精细的剖析，充溢的才华……当然，作者并没有提供一种最后的、终极的答案，这或许是因为对学术问题的讨论并不存在最后的、终极的答案。但他却提供了一种发人深省的智慧，一个让人徜徉其中的精神的乐园，不难想象，当读者捧一卷书在手，如与智者彻夜作抵膝谈，款款然、惓惓然，将会乐如之何！

于是，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写下了上述文字，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	潘知常 1
导言 金刚鹦鹉·金牛犊·金项链	1

偶像与幻术

I 明星的秘密	19
1. 变成符号的人	19
2. 公众的秘密	25
3. 崇拜与禁忌	34
II 广告魔方	38
1. 趣味有争辩	38
2. 喧宾夺主	43
3. 曼陀罗之梦	49
4. 欲壑难填	53
5. 维纳斯的蜕变	59

光影的迷宫

I	图像的魅力	67
	1. 符号化的视觉	67
	2. 图像的世界	75
	3. 图像文化	81
II	感知觉的演化	85
	1. 真实与现象	85
	2. 泛视觉化的艺术	89
III	电视的引力	95
	1. 全息幻觉	95
	2. 画面引导	100
	3. 沟通与封闭	103
IV	卡通文化	107
	1. 简化的趣味	107
	2. 刚性线条	112
	3. 没头脑和不高兴	115

故事的游魂

I	女人的世界	123
	1. “美人”与女人	123
	2. 爱的奢望	130
	3. 唯情的象征	135

4. 失火的天堂	144
Ⅱ 天龙入梦	148
1. 寻找神秘之物	148
2. 虚无的力	157
3. 骑士之爱	161
4. 侠客的自赎	163
Ⅲ 死之舞	170
1. 文化梦魇	170
2. 英雄 · 神祇	175
3. 邪恶的诱惑	180
4. 暴力的意义	184
5. 追逐与逃避	188
结语 《夜莺》如是说	192

1

巴西的波罗罗部落人自称是金刚鹦鹉。据人类学家解释说，这根本不是说他们死后会变成鹦鹉或鹦鹉会变成波罗罗人，而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是真正的金刚鹦鹉了。”^① 这在我们当代文明人看来未免太费解了。无法想象，波罗罗人竟会认为他们自己身上就长着彩色羽毛和钩形喙。人类学家认为，波罗罗人在他们与鹦鹉生理构造的差异背后领悟到了某种内在的同一性，他们相信在自身与某种特定的异己之物间有一种神秘联系——“互渗”关系。

这不是孤立而奇特的现象，而是原始文化的一般特征。人与外物之间的神秘联系造成了原始人格对物的依附，即图腾崇拜。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使当代文明人对“图腾”这个字眼并不感到怎么陌生，而且我们也都被告知，至今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形象如龙凤、麒麟之类都曾是我们祖先膜拜的图腾。尽管如此，我们毕竟不肯相信人与外物之间真会存在着什么神秘的“互渗”关系。原始文化与当代文明之间的距离似乎太遥远，人类已经走过了那么漫长的路程，过去的记忆变得那么依稀渺茫，难以辨认了。这种忘却和陌生大概也是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

2

爱尔根有一个原始部落在过去一直相信一种梦占术，即根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70 页。

据巫师所做的“大梦”来预测未来和指导行动。但在现代文明渗入到这个部落后，这种梦占术便失灵了。他们同外部自然间的神秘联系受到了破坏。据巫师说，自从英国人来了后他便不再做“大梦”了。

庄子说：“古人真人，其寝不梦”。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同化为一体，当然也就不需要以梦中的幻象为中介来提供人与外物之间的神秘联系了。从文明演进的逻辑来说，这是属于前原始状态。文化，即使是最原始的形态，也无可置疑地意味着同自然的分离和异化。然而原始文化之不同于后代文明处，就在于它还不能自觉地承认和接受这种异化状态。原始文化不能自觉独立于自然，但也不可能真正回归自然。这类文化的神秘性就在于它在现实上从自然中脱胎而出之后，仍以超验的方式依附于母体，从中获得营养和庇护。原始宗教崇拜活动的深层心理基础无非是恐惧感和寻求依附的渴望，如婴儿似的心理；形形色色的图腾，如同婴儿紧紧抓着的安慰物一样，成为与母体联系的媒介。

婴儿无论多么弱小，都不可能再回到子宫去，这是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的全部痛苦和希望由此而生。婴儿尽管需要母亲的怀抱和乳头，却还是不得不同它们越离越远——这就是文明。

当第一支手工打制的梭标投掷出去刺杀野兽时，动物觅食的自然法则便遭到了破坏，——“人”这种动物开始越来越超出自己的体力限制去获取食物；当第一堆烧烤食物的篝火点燃起来时，整个生态循环系统都受到了影响——“人”摄取的营养物质越来越多，而返还给大自然的越来越少。这样，人类就在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上日渐同自然分裂了。在这个分裂过程中，人不仅建设起了物质文化，更重要的是在物质文化基础上建设起了精神文化。人懂得了可以主动向自然索取而不是等待自然的恩赐，

同时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向自然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因为人有了认识自然的智慧,这种智慧以经验为基础,通过意志与实践的统一来验证和发展,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之间暗昧而神秘的联系逐渐被操作所控制,被语言所解释。这是同原始文化的神秘性质相冲突的理性精神,它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神秘文化的衰微。古希腊理性精神的第一位重要代表是雅典哲人苏格拉底。他以理性的抽绎方式追问真正的“知识”,从而催生出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和逻辑学。尼采却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认定是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导致了原始而神秘的酒神精神的消亡。

尼采的看法自有他的道理。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罪名之一是“僭立新神”。确实,苏格拉底同当时的智者们一样,把精神寄托从传统的神祇转向了“新神”——人。他相信“能让我学得一些东西的是城市里的人民”,而智者普罗泰戈拉更公然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对外物的崇拜变成了对人自身的崇拜。如果说在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那里,理性精神还由于形而上学的冥想而带着超验的精神色彩的话,到了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则以彻底的逻辑与实证精神把原始文化的神秘精神一扫而光。我国当代学者冯友兰先生曾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人同我国古代的孔子、孟子与荀子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这两组人至少从古典理性主义精神启蒙的角度是可以比较的:孔子代表了一种早期的人本思想,对原始的鬼神崇拜采取一种置而不论的消极否定态度。孟子从先验的道德观念出发鼓吹一种激进的人本思想。荀子则以更理性化和实用的态度彻底否定了神秘文化,他相信人定胜天,认为鬼神妖异之事不过是用来愚弄和控制民众的手段罢了。

古典理性主义者不仅是在使用一种新的、理性的语言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更使人们从崇拜、依附外物的精神中解脱出来。理性的基础是经验和逻辑,这意味着人有了自觉的历史,

并且从自身历史的积累中形成了自律的生成和发展机制，人应当相信自己、认识自己，运用自己的认知和思考能力去行动，不再需要神灵，不再需要图腾来庇护和指导自己了。理性主义的这种信念构成了近代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于人的本质的共识——自由。爱尔根人用梦占术指导自己的行动，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还紧紧依附在物我一体的“大我”（Self）上，现代文明不仅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他们对自然的依附：科学的手段人为地破坏和控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巫术失去了作用，祭司们再也无法感受到自然的呼唤，再也做不出“大梦”了。

理性像精灵般飞翔在文明世界的上空，驱走了图腾的魔咒，召唤着自由的希望。这希望能实现吗？

3

18 世纪末期的巴黎正处在大革命的热潮中，推翻了封建领主与教会的非理性统治后，一些人忽发奇想，号召建立一个理性的宗教来取代天主教。他们还找来一名女戏子扮作“理性女神”，吹吹打打地到国民公会供大家膜拜。

这件事好像是个悖谬：大革命是理性启蒙的产儿，高举的是理性主义旗帜，理性同宗教崇拜的非理性心理是悖反的，何以竟冒出个“理性宗教”，甚至还有“女神”？这个逻辑矛盾暴露出了大众心理的另一面。人类精神尽管在大步前进，脚下却始终拖着浓重的阴影；社会心理没有随着文明的发展而趋同，相反，总是有一股惰性力，一种反动潜藏在文化主潮的下面。这是理性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德国理性主义者、大数学家莱布尼兹相信，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法则“万能算学”，如同数学定理一样。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争执，只要大

家坐下来，“让我们算算吧”，一切便迎刃而解。世界之所以如此混乱，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那种“万能算学”而已。而牛顿则给了人们更切实的希望；他用三条定理便解释了从苹果落地到天体运转等无穷现象。人们再也不能用神秘暧昧的说法自欺欺人，理性应该使一切有起码理解力的人心服口服了。然而竟还有那么多人反其道而行之，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现性主义者毕竟太天真了。当牛顿用三大定律赶走上帝时，人们一下子觉得似乎整个世界就是个牛顿的物理世界（更准确地说，是个宏观、低速的物理世界），线性因果关系组成的连锁使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一切。问题恰恰在于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个物理世界，它同时也是个化学世界。从化学的角度来看，多维因果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使许多现象变得神秘莫测。就心理现象而言，刺激与反射、操作的內化等机械现象是理性意识产生的条件；而脑化学与本能的作用则使非理性或无意识心理与行为成为可能。社会心理中的非理性或无意识倾向，从根本上看，是对理性的因果关系与有序性认识的排斥，它们仍然依恋于前理性的混沌自然状态。

据《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而当摩西上山去领受上帝的诫命时，人们却违背了他的教导，做了一只金牛犊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这个故事揭示出了文明社会大众的非理性心理动机。以色列人不是原始人，当然不相信金牛犊会有什么魔力，然而他们需要一个依附的对象。埃及决不是以色列人的乐园，但却是他们熟悉的家园，即使痛苦也是他们习惯于忍受的痛苦。走出埃及，便步步感到陌生和孤独带来的恐惧，摩西的力量和信心是他们借以逃避恐惧的庇护所。摩西一旦离开，他们便陷入惶恐不安的境地。这不是实际的威胁造成的恐惧，而是在陌生与孤独中失去了依附而产生的对空虚的恐惧，金牛犊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依附对象而满足了以色列人的需

要。我们都知道，走出埃及是以色列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对一般文明史的一个转喻：文明是走出暗昧混沌的故园而追求自由的冒险，它在带来自由的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陌生与孤独的恐惧；大众被希望引导着前进，又由于恐惧感而寻求庇护。这种矛盾性是大众心理的重要特征。

理性与文明的发展没有能克服社会心理中的这种矛盾。现代文明不断地裂解着传统的知识、观念、价值乃至社会关系，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强烈的陌生、孤独与异化感，从而助长着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文明人不会再与一只金刚鹦鹉认同了，却可能用形形色色的金牛犊来作为心理庇护的象征。近年来在我国大众生活中风行起了烧香拜佛、求签问卜等种种神秘文化活动，就连深奥晦涩的《周易》也变成了畅销书。有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封建迷信”的复活，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根据，但如果用来概括大都市乃至高文化阶层的这类活动，也许太简单了。一位封建时代的普通农民求签算命同一位当今的大学教授请人看手相，两种活动表面上相似，而心理动机却有所不同：前者是在寻求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即“命”；算命是为了现实行动的需要——趋吉避凶以协调自然与自身的物质关系。而后者即使不完全是好奇，也是在试图用一种神秘的符号代码来解释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困境，这种算命是一种反身的精神需要，即把现实经验构造成象征，使自己在观照中得到依附感和安慰。有的青年因为听信算命的结果而导致婚姻悲剧甚至人命惨案，这种事当然可认为是“封建迷信复活”，即原始心理固着所致。然而许多女大学生占卜问婚姻大事决不是为了指导行动，而是为了摆脱情感纠葛造成的心理失衡状态。总之，当代人的心理依附需要仍然存在，但更加象征化了。

上述神秘文化活动带着明显的旧文化色彩，因而被认为是

“封建迷信”复活。然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倾向并不仅仅是部分旧文化活动的再现。当代大众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行”，即大规模地相互认同和仿效，从对一本小说、一支歌曲的欣赏一直到对一种商标、一种牛仔裤臀部补丁式样的喜爱，几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无论对所流行事物的具体内容可作出多少理性的解释，都无法否定这种现象的非理性心理基础。大规模的追随、认同和仿效，使种种文化现象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说到底是在以象征的方式寻求心理归属与依附，是一种显示出当代特点的大众图腾崇拜。

人类从自然的子宫中娩出至今，已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图腾崇拜像一块胎记似的始终没有抹去。当代人仍然像古犹太人一样，一面雄心勃勃地开拓前进，一面怀着恐惧之感寻找庇护。愤世忧时的先知们不断地向人们发出警告——战争、生态、人口、能源、犯罪……这个世界危机四伏，处处是威胁。难道靠屁股上的一块名牌补丁就能躲过这一切？当然不是。走进舞厅去问问正在劲歌狂舞的时髦青年他怕什么？他也许很有钱，不怕贫穷；他年轻潇洒，不怕找不到中意的情侣；他不是显贵大亨，不必为国家大事伤神；他又没有高深的学养，全不知那些形而上的困惑……一切都很美满，有什么可恐惧、可逃避的？他在尽情享受，尽情宣泄，并没有担心什么，更没有逃避什么。然而我们看得出来，他享受的乐趣并非真正来自他个人的需要：他由抽“健”牌香烟改为抽“红塔山”，并不是生理状况导致的口味变化；由穿紧绷绷的牛仔裤改为上肥下窄的奔裤，也不是因为后者更舒适。他的乐趣是随着一个文化圈的潮流涨落的。同样，他在劲歌狂舞中所宣泄的也不是个人的东西，他拿起卡拉OK话筒唱歌时带着几分某歌星的姿势和腔调；他跳的狂放淋漓的霹雳舞一招一式都是时下大家都学过的。总之，他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是在流行趣味中随波逐流而得到的。我们问他恐惧什么会是